



全国高等院校本科教材  
全国高等院校专升本教材

# 中国古代文论读本


(《中国古代文论》修订版)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组织编写

李壮鹰 主编

周波 李辉 副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全国高等院校文科教材  
全国高等院校专升本教材

# 中国古代文论读本

教育部师范教育司 组织编写

李壮鹰 主编

周波 李辉 副主编

编写者 李壮鹰 李辉 杨存昌

周波 施荣华 彭笑远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内容提要

本书为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是2001年版《中国古代文论》的修订版。

本书原版按照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的线索,选录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在理论建设上有意义、有深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论著,进行了注释和评析。修订版在总体上仍然属于论著选读的性质,以选文和注释为重心。但在修订过程中,增加了选注篇目,调整了结构,按照时代变迁,分设六编,每编由“概述”及选文“注释”、“评析”、“附录”四部分组成。这样就形成了史、论、评、注相结合的新框架。“概述”可以帮助读者全面理解各时期的文论语境、概况和特点;每篇选文后的“评析”能使读者对特定的文论观点在纵向和横向上相联系;“附录”则围绕该篇的理论重心,选录历代与此有关的一些资料,以使读者看到古人对该理论的认识过程。这种文、史结合的模式,有利于学生在有限的课时内掌握更系统的中国古代文论知识。

本书适于作高等院校本科教材及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教材,也可以作为古代文论考研及研究者的参考用书。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论读本/李壮鹰主编;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7

ISBN 978-7-04-023202-8

I. 中… II. ①李…②教… III. 古典文学-文学理论-中国-高等学校-教材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47379号

策划编辑 肖冬民      责任编辑 金学影      封面设计 张雨薇  
版式设计 张 岚      责任校对 胡晓琪      责任印制 尤 静

出版发行 高等教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  
邮政编码 100120  
总 机 010-58581000

经 销 蓝色畅想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16  
印 张 28  
字 数 520 000

购书热线 010-58581118  
免费咨询 800-810-0598  
网 址 <http://www.hep.edu.cn>  
<http://www.hep.com.cn>  
网上订购 <http://www.landaco.com>  
<http://www.landaco.com.cn>  
畅想教育 <http://www.widedu.com>

版 次 2008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8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6.00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请到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物料号 23202-00

## 修订说明

与原书相比,选注的篇目和内容有所增加,体例上也有不小的变化。其目的是在有限的篇幅内尽量扩大教材的容量,并力图使之具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和更广泛的实用性。

2001年版的《中国古代文论》属于论著选读的性质,按照文论发展史的线索,选了历史上有代表性的,在理论建设上有意义、有深度的文学理论和批评论著,进行了注释和评析。同时,考虑到我国文学理论的外在形态比较零散,除了在每篇的注释和评析中尽量照顾到前后时代的联系之外,也在每篇选文之后设有“附录”,围绕着该篇的理论重心,选录了历代与此有关的一些资料,以使读者能看到古人对该理论的认识过程。这次修订,在继续保留原有体例的同时,为了使读者更为清晰地把握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将全书的选文按历史时期分为六编,每编前面设一篇“概述”,综论每一时期文论批评的文化背景和发展概况,等于对每编选文的一个“导读”。这样,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新教材就是一个史、论、评、注结合在一起的新框架了。

新版教材分六编,每编由概述、选文注释、评析、附录四部分组成。全书总体上还是属于论著选读的性质,以选文和注释为重心,这体现出高校本科古文论学习要以文本细读为基础的精神。也正是为了突出教材的这一基本特点,故新版名为《中国古代文论读本》。然而,对每一篇文本的了解,还毕竟只是一个一个的“点”。通过注文后的“评析”和“附录”,期望能使读者对特定的文论观点在纵向和横向上相联,形成一种“线”的把握。而每一编前面的“概述”,则可以帮助读者全面理解本时期的文论语境、概况和特点,这就是一个“面”了。换个说法,如果把学习过程比作“观看”,那么注释是“谛视”,评析和附录是“巡视”,而概述就是“俯视”。编者希望通过这样的安排,使读者对中国文论获得一个多角度的、“立体”的认知。同时,我们觉得这样的设计,可能也更加适合目前国内高校本科开设古文论课的实际需要。本科学古代文论,最好从选本学起。然只讲文论选,很容易零碎。而因课时所限,又不可能系统讲授文论发展史。故这种文、史结合的模式,有利于在有限的课时内掌握更系统的古文论知识。当然,这些考虑,都只是我们的主观愿望。它是否能够兑现,尚有待于读者在实践中去检验。

《读本》的选注篇目,比修订前有所增加。原书的精神,是只注重选篇的理论

价值,不求“史”的完整。而现在按时代分编,增加“概述”,无形中突出了“史”的视角,故增加篇目实不可免。比如先秦时期的有关篇目,虽并非具体论述文学问题,但因先秦是整个中国古代思想的“轴心时代”,不论是六经还是诸子,其观点对后世各个领域的思想都有统率意义,对后世文学理论基础的奠定和发展,也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们是文论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故要使读者对后世的文论追本溯源,对其发生、发展的脉络获得较完整的认识,修订本所增加的先秦选文都是不可或缺的。当然,为了避免内容过多、篇幅过大,书中选文多采取节录的形式。选文的标准,还是恪守初版的精神,以建设性的理论为主,一般的评论性的东西尽量不选。但古人的新思想往往在对作品的评论中提出,所以评论文字不可能完全剔除。在注释方面,考虑到本科生的需要,对中古以前的选文释例较详,唐宋以后的选文则从简。注文在疏通文意的基础上,着重于对理论思想的阐发。

总之,一部文本选读性的教材,其对材料的去取,牵涉到编者的理论眼光和对历史的整体把握;其对选文的评论与注释,也直接反映着编者的学识与功力。本书虽属修订,但因编者水平的限制,肯定还会存在这样那样的纰漏,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

李壮鹰

二〇〇七年八月二十五日于北师大

## 原版前言

我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有着光辉灿烂的文学，其在思想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为世人所瞩目，在世界文学遗产宝库中占有崇高的地位。同时，我国古人也在长期的创作和欣赏实践中，以我们民族的独特的视角，对文学的规律进行了不倦的探索，所以产生了许多深刻的文学理论和精当的文学批评。从历史上看，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它一方面反映着文学创作的倾向和水平，同时也指导着作家的创作实践。因此，不了解我们古代的文学理论，也就无法深入了解我们古代的文学。从现在来说，要繁荣我们的新文艺，建构具有我们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也需要在总结和继承古文论遗产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我国的文学理论与古代文学一样，我国的古代文论也是源远流长的。它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先秦两汉时期，是古代文论的奠基与酝酿时期。在先秦，尽管文学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尚未取得独立的地位，但思想活跃的诸子在阐述各自的社会理想与哲学时，往往会包含有关于文学的思考。其中对后世影响最巨的是儒家和道家。儒家出于政教中心的立场，强调文艺与政治、道德的联系，重视文艺的教化作用，从而为后世正统的“文以载道”的文学观奠定了基础。道家倡自然无为、冥契大道，他们所强调的人在面对自然时的超功利、超理智的态度深通于艺术的审美观照与创作灵感，所以成为后世的审美理论的滥觞。汉以后，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经学盛行于世。但随着文学创作的日益繁荣，人们关于文学的思考却一直在向纵深发展：汉人所作的《毛诗序》，不仅全面地总结了先秦人关于诗的认识，而且对于诗的社会作用、艺术特质的分析，都超越了前人；而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则表达了一位文学家的历史使命感，其中所提出的“发愤著书”的观点，深刻地揭示了古代文学的社会的和心理的成因，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古文论的成熟时期。由于汉末社会王纲解纽，儒学的思想束缚被打破，所以文学终于摆脱了经学的束缚而获得了自己独立的地位。相对宽松的社会环境，刺激了人们的思想，从而使人们关于文学的思考也空前活跃。曹丕的《典论·论文》是我国历史上第一篇关于文学的专论，它首次把文学作为一个专门的对象来考察，高度强调了文学的独立的社会价值，并开始探讨作家作品风格和文学批评的一般准则。陆机的《文赋》，将文学创作过程作为探讨的

对象,对文思的缘起以及艺术构思的心理机制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剖述。刘勰的《文心雕龙》更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论著作,它“弥纶群言,唯务折衷”,在文学的本体论、功用论、作家论、作品论、文体论、批评鉴赏论等方面,均提出了很多精审而深刻的看法,其所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命题、概念范畴,甚至研究方法,都对后世的文论建设和作品评论发生了深远的影响。钟嵘的《诗品》,是这时期出现的专门评诗的著作,它标志着我国诗学冲出了单纯阐发《诗经》的狭隘领域,而开始致力于对诗歌普遍规律的研究。《诗品序》中对诗歌审美特质的强调,也成为后人论诗的主臬。

唐宋以后,古文论的发展进入了深化、拓展时期。人们在魏晋南北朝的基础上,对前人所提出的文论理念和范畴作了更为深入的阐说与发挥。大体来讲,这种阐说与发挥是沿着两条线来进行的:一条是沿着儒家的以政教为中心的线索,如韩愈的《答李翊书》,强调创作主体的思想道德修养;白居易的《与元九书》,强调文学对现实政治的干预,都是此类的例子。另一条则是沿着道家的以审美为中心的线索,中间又接受了佛学的影响,从而对文艺自身的审美特质有深入的发明。王昌龄的《诗格》和皎然的《诗式》,都较早地标举“境”这一审美范畴,对不同的诗境和艺术美诸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旧题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则通过生动的意象描述,向人们展示了各种风格的意境特征。入宋以后,作品的审美特征渐渐成为作家们注意的中心,苏轼所提出的“有所不能自己而作”,“非敢有作文之意”以及“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的理论,正是在道家“自然说”的影响下,着眼于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而立论的。其后如范温论“韵”,杨万里论“味”,一直到严羽“以禅喻诗”,都对文学审美对象的特质作了深刻的揭示。

明代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是个很特殊的时代,它可以说是传统的文学思想发生变革的时期。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由于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社会上掀起了一股冲击封建礼教、要求个性解放的思潮。这种思潮在文论上的集中代表,就是李贽的《童心说》。李贽理直气壮地要求文学表现人类的真情实感,并大胆地将矛头指向污染人们灵魂的封建礼教和经典,在当时可谓石破天惊,振聋发聩。此后的公安派,以激进的“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来对抗复古派的拟古,以辩证的文学发展观来对抗他们的文学退化论,甚至钱谦益在明清之际对真情的强调,都是个性解放思潮影响的结果。另一方面,随着城市和市民阶层的不断扩大,反映市民情感的民歌以及小说、戏剧大大兴盛起来,它们给沉闷已久的传统文坛带来了勃勃生机,并引起了文人的瞩目,于是,相当成熟的小说、戏剧理论在明清之际应运而生。李渔、金圣叹等论者,一反过去文人的传统偏见,不但给小说与戏剧的社会价值以很高的评价,而且对它们思想和艺术都作了精辟的分析。

清代是古代文论的总结时期。很多的文论家,都着力于对前人理论的系统

而全面的概括,并提出自己的新看法。王夫之总结了历来作诗和论诗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着重从情景关系上深入地论述了诗歌的本质;叶燮的《原诗》则在总结前人的基础上,建构了一个颇为精密的诗学体系。而王国维于清末民初所写的《人间词话》,以“境界”来论说诗歌中的审美对象,涵盖了前人的各种角度的论述,更可以说是对整个古典诗学的一个总结。

本书正是基于上述的历史线索而选编的。因为是教材,有课时的限制,所以对历史上的文论著作不可能逢优必取,书中选定的这40篇,一方面出于历史的标准,即看它是否能代表特定历史时代的文论的最高水平,是否在当时和后世产生过巨大影响。另一方面也考虑现实的价值,即该文在今天看来是否有理论借鉴意义。出于这两种考虑,所以本书既选了如《典论·论文》、《文心雕龙》这些在我国传统文论的建构中发生极大影响的著作,同时也选入了像邵雍的《伊川击壤集序》、钟惺的《诗论》这类虽在历史上并不引人注目,然而在今天看来却能启发人思考的作品。

入选篇目以建设性的理论为主,文学评论一般不选;选篇注重纯文学理论,关于一般文章的理论 and 近于文章学一类的著作尽量不选。不过,因为古人的理论阐述与文学批评经常结合在一起,而我国古代的“文”的概念长期以来又都是比较宽泛的,所以选文中的文学批评和文章学的成分不可能完全剔除。

本书的编写体例,每篇选文都分为正文、注释、评析、附录四部分。正文选择经过校勘的善本;由于篇幅的限制,对有些较长的选文,采取了节录或选录的方式。注释力求在疏通文意的基础上,将重点放在对其理论精神的阐释上。评析中就该篇文论的社会思想背景,其主要理论内涵,它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等方面作扼要的阐述。同时,为了使读者更好地把点和面结合起来,对该文所提出的理论的历史源流获得一个广阔的视野,在每篇的评析之后还适当地选有历代与此篇在理论上相关的其他论述作为附录,以便读者在学习和讲授中参考。

本教材的编写,借鉴了其他的同类教材。其中的个别篇目的注释,参考了1992年出版的《中华古文论选注》(李壮鹰主编)。在编写过程中我们尽量汲取学术界的研究成果,但考虑到本书的教材性质,对于尚未成为定论的新说则取审慎的态度。

本书由李壮鹰(北京师范大学)任主编,周波(山东师范大学)、李辉(云南师范大学)任副主编,由李壮鹰、周波、李辉、施荣华(云南师范大学)、杨存昌(山东师范大学)执笔。集体讨论确定篇目,然后分工撰写。其具体分工为:《论语》、《庄子》、《毛诗序》、《报任少卿书》、《潜溪诗眼·论韵》、《夏均父集序》、《颐庵诗稿序》、《沧浪诗话·诗辨》、《姜斋诗话》、《人间词话》的注释、评析和附录由周波编写。《典论·论文》、《文赋》、《宋书·谢灵运传论》、《文心雕龙》的《原道》、《神思》、《物色》、《风骨》、《知音》、《时序》以及《诗品序》的注释、评析和附录由李辉编写。



《诗格》、《诗式》、《答李翊书》、《与元九书》、《与李生论诗书》、《伊川击壤集序》、《南行前集叙》、《答谢民师推官书》的注释、评析和附录由杨存昌编写。《二十四诗品》、《诗集自序》、《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童心说》、《雪涛阁集序》、《诗论》、《闲情偶寄·词曲部》、《原诗·内篇》、《复鲁蕻非书》的注释、评析和附录由李壮鹰编写。《季沧苇诗序》、《读第五才子书法》、《读第六才子书西厢记法》的注释、评析和附录由施荣华编写。全书最后由李壮鹰统一定稿。

李壮鹰

二〇〇〇年十月二十日

# 目 录

第一编	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观念	1
	概述	1
	论语(选录)	孔子 7
	孟子(选录)	孟 轲 15
	庄子(选录)	庄 周 25
	荀子(选录)	荀 况 34
	毛诗·关雎序(节录)	49
	报任少卿书(节录)	司马迁 58
	论衡(选录)	王 充 64
第二编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批评	85
	概述	85
	典论·论文	曹 丕 91
	文赋	陆 机 100
	文心雕龙·原道	刘 勰 119
	文心雕龙·神思	刘 勰 127
	文心雕龙·物色	刘 勰 135
	文心雕龙·风骨	刘 勰 142
	文心雕龙·时序	刘 勰 149
	文心雕龙·知音	刘 勰 164
	诗品序	钟 嵘 172
第三编	隋唐五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	189
	概述	189
	诗格(选录)	王昌龄 195
	诗式(选录)	皎 然 198
	答李翊书	韩 愈 209
	答刘正夫书	韩 愈 212
	董氏武陵集纪	刘禹锡 216
	与元九书	白居易 221
	谕业(选录)	皇甫湜 232

	与李生论诗书 .....	司空图	235
	与叔浦书 .....	司空图	239
<b>第四编</b>	<b>宋金元时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 .....</b>		<b>243</b>
	<b>概述 .....</b>		<b>243</b>
	伊川击壤集序 .....	邵雍	249
	南行前集叙 .....	苏轼	255
	答谢民师推官书 .....	苏轼	256
	自评文 .....	苏轼	259
	论文 .....	李廌	264
	潜溪诗眼·论韵 .....	范温	268
	夏均父集序 .....	吕本中	276
	沧浪诗话·诗辨 .....	严羽	280
	论诗三十首(选录) .....	元好问	288
<b>第五编</b>	<b>明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 .....</b>		<b>293</b>
	<b>概述 .....</b>		<b>293</b>
	梅月先生诗序 .....	李梦阳	297
	诗集自序 .....	李梦阳	298
	与郭价夫学士论诗书 .....	王廷相	303
	童心说 .....	李贽	310
	杂说 .....	李贽	312
	叙小修诗 .....	袁宏道	318
	雪涛阁集序 .....	袁宏道	320
	诗归序 .....	钟惺	325
	诗论 .....	钟惺	326
	警世通言叙 .....	冯梦龙	333
	季沧苇诗序 .....	钱谦益	338
<b>第六编</b>	<b>清代的文学理论和批评 .....</b>		<b>343</b>
	<b>概述 .....</b>		<b>343</b>
	读第五才子书法(节录) .....	金圣叹	349
	姜斋诗话(选录) .....	王夫之	356
	闲情偶寄·词曲部(选录) .....	李渔	367
	原诗(内篇) .....	叶燮	375
	论文偶记(选录) .....	刘大櫆	403
	复鲁黎非书 .....	姚鼐	409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	梁启超	414

人间词话(选录) .....	王国维	423
后记 .....		434

## 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观念

## 概 述

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在几千年的文明史中，我们的祖先不但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学，同时也基于长期的创作和欣赏实践，以我们民族的独特视角，对文学规律进行了不倦的探索，因此产生了许多深刻的文学思想和精当的文学批评。从历史上看，我国古代文论的产生与发展，是与整个社会文化的演变与文学本身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最初，文学蕴涵在原始文化之中，人们的文学观念，也孕育在整个的文化观念之中。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意识形态的分化，文学的观念也逐渐明晰，于是才有自觉的文学创作和独立的文学理论探讨。而且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人们对文学规律的思考也不断地深入和系统。但即便如此，文学和文论也不是孤立的，它们始终与各个时代的整个文化背景、与社会意识形态的其他领域密切相关。故研究中国文论的历史，必须结合文化史来考察。

先秦时期，是文学在整个原始文化中逐渐孕育成形的时期，也是文学观念的萌芽和奠基时期。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我国的文学艺术，最早胎息于原始的巫术，也就是我们古人所说的“乐”。这诗、歌、舞三位一体的活动仪式，是初民们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情况下，以主观蒙昧的方式来处理他们与自然的关系的途径。他们通过乐舞来娱神、贿神，以期与异己的力量达成一种虚假的平衡。《尚书·尧典》所谓“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正是这种意识的反映。史料证明，我国的夏商以前，就是“为乐以法治”，亦即以巫术为维系社会的主要上层建筑的时代。而作为巫术基本形式的诗、歌、舞，就是后世文学艺术的滥觞。夏商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文化从原始巫术中渐渐脱出，人们的观念也从蒙昧的奉天转为理性的重人。周代从原始祭祀中所生发出来的“礼”的精神，就是这种转变的结果。“礼者，别贵贱，序尊卑之谓也”，与夏商前的“乐”主要功能在敬天事神不同，“礼”是治理人的一套制度，它虽然维护等级和特权，但其中包含着强烈的人文精神，故从历史主义的角度来讲，的确可以说周代是中国人本主义的黎明。当然，周代也继承了古代的“乐”，但与古人强调贿神不同，他们强调以乐来教民、

化民，使之合于“礼”的精神：“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周礼·春官·大司乐》）；“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周礼·地官·大司徒》）。故“乐”在周代纳入了“礼”的范围，并成为“礼”之附庸。在周代的文化体制中，“礼”与“乐”密切结合，“礼非乐不行，乐非礼不举”（郑樵《通志·乐略》）。也正因为如此，人们称周代文化为“礼乐文化”，又将周人围绕着治民而建立起的一整套典章制度称之为“礼乐”。周代的“礼乐”之中，包含了更多的文艺因素：因为种种的礼乐仪式，贯穿着音乐和歌舞等艺术活动，而礼乐文化在文本上的结晶、亦即后来被称作“经”的《诗》、《书》、《易》、《礼》等典籍，即是文学的雏形。这些因素，对周王朝的治国安民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东周末年的春秋时期，是中国古代社会又一次发生激烈变动的时期。由于封建制的生产关系取代了奴隶制，原先的奴隶主在文化上的垄断权也就逐渐丧失。随着王纲解纽，整个社会出现了“礼崩乐坏”的局面，周时的官学也彻底被颠覆。古者学在官府，非吏无所得师，故《说文》释仕之古义：“仕，学也。”章太炎说三代之学术为“非仕无学，非学无仕”（《诸子学略说》），正说的是古时官外无学的情况。而东周之后，随着政治的解体，从官僚机构中分化出来的“士”（通“仕”）的群体不断扩大，于是私学产生并迅速普及，而且很快地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势。代表不同阶层的各种学派各自阐述自己的主张，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使得这一时期的学术思想空前的活跃。而各家辩论的中心之一，就是对式微了的“礼乐”文化的态度和对《诗》《书》等典籍的评价。由于《诗》《书》礼乐与文艺直接相关，故诸子的文艺观也就在辩论中得以集中展现。

以孔子为代表的早期儒家，基本上是站在继承和维护周代官学的立场上的，故在政治和文化上都带有较为强烈的复古色彩。孔子在政治上强调恢复西周的大一统：“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由天子出”（《论语·季氏》），在文化上亦强调法先王、复礼乐。他崇拜制礼的周公，赞美周代灿烂的文化：“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并以周代文化的复兴者自任：“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孔子所说的“文”，指文化，具体指“礼乐”，故他讲对人的教育，是“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从继承礼乐文化出发，他精心收集、整理前代的文化典籍，又因鲁史记而亲撰《春秋》，从而为后世留下了多部经典，这是孔子在文化传承上的伟大功绩。当然，从孔子的整个社会思想上看，他绝非单纯的复古，如某些人所说的“开历史倒车”，而是适应了历史的发展，在充分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的基础上，提出了以“仁”为中心的人本主义学说，从而创立了影响中国整个历史的儒家学派，也奠定了中国几千年的正统思想。“仁”字春秋以前就有，如卜辞的“怀于有仁”，《诗经·郑风》的“洵美且仁”之类，但这些偶见的用例远没有形成一个固定而完整的概念。而“仁”字在孔子的言论中是被反复强调的，《论语》中论“仁”者达五十八章，“仁”字凡 109 见。关于这个概念，

孔子虽未给予直接的诠释,但其内涵还是极为明确的。《礼记·中庸》云:“仁者人也。”《孟子·告子》中的“仁者,人心也”,皆可移以释此。它的根本含义,就是把人真正视为人。上古社会的分群立国,只据种族血缘,同族者视为人,异族者因“非我族类”,则不视为人,故对外夷,有鬼方、犬戎、獯、豷、蛮、貊之称;西周时俘获外族奴隶称“民”而不称“人”,亦为其例。而所谓“仁”,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坚持众人同为同类,人之相处,要“以人度人,以类度类”(《荀子·非相》);“仁者,爱类也”(《淮南子·主术训》),要以同类所应有的同情心去待人、爱人,故孔子云:“仁者爱人”、“泛爱众而亲仁”也。当然,因为周代本身还是一个种族奴隶制社会,故力主兴周的孔子未能摆脱历史的局限,他的“仁”还远远不是平等和博爱,甚至不是后来墨子所提的“兼爱”,而是以维护宗法和等级制度为前提的,故仁要受“礼”的规范。但这个局限并不能湮灭孔子仁学的人道主义光辉。在孔子看来,“仁”是社会文化的根本精神,礼乐应该建立在“仁”的基础上:“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孔子的这种思想,长期地影响了我国的政治与文化,也为文学的发展树立了重要的原则。文学就是人学,只有面向人类社会,表现、交流人的思想感情,才成其为文学。同时,从理论上讲,仁爱之目标的揭橥,也为后世具有民主进步倾向的文学与文学批评奠定了思想基础。

孔子对文学艺术的评价,是从他的仁学出发的,比如他强调作品在道德上的“无邪”(《论语·为政》),强调美和善的统一,强调《诗》在沟通人类情感上的“兴观群怨”的作用等(《论语·阳货》),都是如此。另一方面,他也强调文学要服从政治的功利,要以“礼”为规范,故他要求文学要为政教服务,艺术活动不可任情而越礼,他批评逾越礼法的“郑声”,主张无过无不及的“中和”。这些倾向,对后世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发展,无疑又是一种阻碍。

孟子是战国中期儒家的代表。当时,周王朝实已不存,一些强大的诸侯国为逐鹿天下,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展开激烈的较量。与此相应,获得了相对独立地位的“士”们在思想上也展开了更加激烈的论争。孟子继承了孔子肯定礼乐的思想,但由于时代的影响,他在政治文化上的复古色彩已没有孔子那么强烈。他从孔子的“仁”出发,创立了具有严密体系的儒家心学。孟子将“仁”上升到普遍人性的高度,认为亲亲、敬长等道德为人类先验的善良本能。他认为人之修养,是对这种本能的复归;开明之政治,是对这种本能的扩大;良好的世风,是对这种本能的推广。他的哲学是以这种本善之“心”为本位的。也正因为他认为善之根本在人心之内,故对孔子所谓的“礼”,他不主张从外部死板地去遵奉,而主张从内部仁心出发的“权”:只要出于仁心,暴君可以诛,礼仪可以破,言可不信,行可不果。也正因为他以心为本,故孟子对先王留下的《诗》《书》经典,亦不重其外在的言辞,而以得圣人之“意”为尚:于《尚书》,他可以说:“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甚至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心下》);于《诗》,他强调“不以文

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上》),这些精辟的论述,都与道家所谓“得意忘言”相通。尤其值得指出的是,他在人心相同而相通的理论基础上所提出的“以意逆志”的读诗方法,揭示了文学欣赏中“体验”这一重要的心理机制,对后世文论中的欣赏论具有重大影响。此外,也正是基于以心为本,孟子对于修养不重外向的求索而重内向的涵濡;不重自外向内的规范,而重由内向外的自发。他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养气说、自得说,为后代文论中的作家论、创作论奠定了理论基础。

从后世儒家的所谓“道统”的视角上说,荀子属于儒家的“另类”。他是应时代之变,把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把儒术与法制焊接在一起的人物。荀子处于战国末期,其时天下统一大势已定,历史呼唤着一种既有凝聚力又有权威性的意识形态的产生,来作为新的封建制的统一帝国建立之保障,而这个使命是由荀子来完成的。为了使儒家的仁学接纳法家的法制,荀子发挥了孔子学说中强调“礼”的规范性这一面,改孟子的“性善说”为“性恶说”,于是大力提倡改造人心、规范言行的必要。他提出“立隆正”,重新强调了一度被思孟学派弱化了了的圣人和经典的外在权威,从而提出了原道、征圣、宗经的观点。这一要求,成为后世著书立说的法定标准和正统信条,它对文学创作注重社会内容、克服淫靡的形式主义倾向曾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它是后世所谓“文以载道”的保守文论的开端,对于文学意识的独立和自由创作都是一种钳制。

先秦诸子除了儒家,还有墨、道、法等各派,这些学派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否定包括文艺在内的“礼乐”的,只是所占的立场不同。墨家站在小生产者的立场上,以“奢侈”为由而反对文艺;法家站在新兴的封建权势的立场上,以“乱法”为由而否定文艺。两家的文艺观都有很大偏颇。值得重视的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庄子在世时间约与孟子同时,此时六国的政治纷争最为剧烈,诸子的思想也最为活跃,它是中国士人的思辨理性达到高峰的时期。前文已述,孟子哲学的深刻性和体系性大大超过了前代,同样的,庄子的学说也有这个特点。作为一个成熟的思想家,庄子的哲学具有一种理论的超越性,非如他前后的一些学者,所提出的思想多为出于功利而对现实的某种对策。这种超越,来源于对各家学说的总结与升华,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说道家的产生是“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见《史记·太史公自序》),是极有道理的。庄子在思想史上的最大功绩,即在于将人的视线从人自身引向对无限的世界的体认,而且他发现了功利的态度和知性的工具在认识无限上的局限,主张以物我同一的体验来把握存在的真髓。从此出发,他否定了思维,进而否定了语言,又进而否定了文学艺术。然而,他对文艺的否定并不同于墨家与法家:墨、法是出于功利而否定艺术态度,而庄子却是出于无功利而泛化了艺术态度。众所周知,文艺的核心本质为审美,而被庄子视为无限世界之真髓的“道”,正是一种“大美”,他主张人们放弃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而与“道”相契合,正是一种审美的态度。也正因为如此,虽然庄子在表面上有“擢



乱六律，铄绝竽瑟”，“灭文章，散五彩”（《庄子·外篇·胠篋》）等毁灭艺术的过激言论，但他在整个哲学精神上却是诸子中最最富有诗意和艺术气质的。他主张艺术的直觉方式，主倡艺术的人生态度，推崇超功利的“虚静”，强调超语言的感受，提倡主体交流时“得意忘言”的默契，提倡观物时的“离形取神”和“目击道存”。所有这一切，都深刻地揭示了艺术思维的特殊规律，对后世的美学探讨和艺术批评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战国之后，秦以强有力的政治和军事取得了天下，为中国历史开辟了封建大一统的新纪元。然其暴起而速亡，证明了激进的法家政策在治国上的致命弊端。故代秦而起的汉代，经过多年在道、儒二家之间的抉择，最终选择了“独尊儒术”的方针。西汉前期的文人，尚保持着战国士人的很多特点，比如强调人格的独立、重视个体的生命价值和强烈的现实关怀等。这些特点，在史学家司马迁身上表现得十分突出。他继承了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在《史记》中为项羽、陈胜等“败王”立“本纪”、“世家”，如实描写“叛臣”韩信、刘安的事迹，并且不惮世讳，大胆地揭露当代帝王的种种短处，表现了先秦士人秉笔直书、不畏强权的可贵精神。他将文学著述视为生命价值的体现，在身遭残毒的宫刑之后，之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就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文学抱负，完成《史记》并使之“藏之名山，传之其人”。为此，他不但“就极刑而无愠色”，甚至“虽万被戮，岂有悔哉”（《报任少卿书》）。司马迁的这种精神，在我国历代文学家中是具有代表性的，正像他的坎坷境遇也具有代表性一样。中国文学在长期沉重的封建桎梏下之所以仍能光辉灿烂，呈异彩于世界文学之林，与中国文人的这种精神具有极其密切的联系。同时，司马迁又提出了“发愤著书”的观点。他指出，作家之所以会写出名垂后世的作品，乃因为“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退论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报任少卿书》）。此说的提出，与司马迁的个人遭际分不开，但由于他的遭际在整个封建社会的正直文人中具有代表性，故这种理论对我国的古代文学史也就具有相当广泛的概括性。

暴秦灭学，对古代文化遗产破坏很大。故汉代建国伊始，便面临着发掘、整理、阐释先秦经典的文化使命。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群体——经生便应运而生。他们在对古代文献的抢救与流布和对先秦思想的总结上，起了重要作用，但也通过绍述和阐释的方式，在古代思想中掺进了时代的精神。《乐记》和《毛诗序》，是汉人对先秦儒家有关诗乐理论的总结。尤其是《毛诗序》，因为它只涉及《诗经》之文本，所以与文学理论的关系更加密切。现在看来，《毛诗序》对《诗经》的解释，多为脱离作品原意的主观臆断。从读诗的方法上来说，它实为春秋“赋诗言志”时“诗以合意”的延续，只是把“赋诗”、“引诗”的方式变成了“解诗”而已。这对于正确领会文学作品的意旨是极其不利的。比起孟子的“以意逆志”与“知人论世”，《毛诗序》之解诗法无疑是一种退步，反映了经生抱残守缺的一面。但